

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書寫： 香港的例子*

一 序言：歧義的香港論述

回歸十多年，香港的其中一個最糾纏的論述命題依然可以用這句話來歸結：「香港往何處去？」

為此，各種新舊論述試圖解答、預告以至進一步誘發這個命題。本文則想說明，現存各種套路化的論述本身都很有局限，現實可以比論述更弔詭，各種概念性的隱喻和標籤並不完全恰當，各論述背後的價值取向亦不同，它們之間將互相爭持、相互滲透但始終難以調和。引申而言，香港的不確定性將繼續下去，香港存在的自主空間有限（但是有可為），雖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兩種制度並存，但是香港的自主性將越來越受制於中國，不過中國對香港——相應着中國對國際社

* 本文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12月17日至18日。修訂於2012年2月。

會、中國對世界經濟體系——的行為也是受制約的。（本文盡量以「中國」指謂「一國」，而以「北京」和「內地」指謂政府或地域。）

本文將談到大家熟知的套路化論述包括發展主義、法治自由、現代化、階級分析、管理主義、殖民地遺產、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以及較近期的特區例外論、中國天朝主義及各種本土的論述等。通過梳理這些不同進路的香港書寫——各種香港書寫背後都有一套溢出香港範圍和文本自身的通論性假設——本文將提出一些針對這些論述的想法。

殖民者的論述，從早期開始，帝國欲望、文明教化與法治的自由港皆被提出，漸漸固定在法治自由地區一說，雖然一百多年的現實並不完全對應，但也有一定基礎。二戰後國共兩政權都因為實際考慮——包括國內外政治和經濟考慮——沒有盡力要求收回殖民地，尤其是中共，更提供了殖民地繼續存在的自圓其說的說法和權宜政策。除了短暫的文革早期極左行為外，在香港的親北京左派依從北京統一戰線政策來論述香港，爭取居民歸心新中國，在內地則強調香港作為對外橋頭堡的功能。從一九四九年前後逃共南來者，香港是跳板、客居地、避風塘、福地甚至天堂。冷戰期間，美英帶動的論述讓香港自我理解

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但形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卻屢受阻攔——雖然香港知識份子的民主書寫從沒有間斷（Pepper 2008）。這個時期不少人已經把香港放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現代化框架來理解，作為轉口港、製造輕工業品的工業化地區、血汗工廠、現代化城市、購物天堂、中西交匯摩登都會、放任主義市場經濟、起飛的發展主義奇葩、非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奇跡，四小龍之一。到一九八〇年代，更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眼光來看這個新興金融中心、全球城市、市場原教旨的模範生。大約同期，中國作為香港主權國的觀念被殖民宗主國明文肯定，雖然中國對香港主權仍將大致屬於「抽象的主權」（Shen 2008），而香港人的維持現狀的意願與身份意識也在強化，香港的特殊性為主權國認可，進入了基本法的視野，落實為一國兩制。

這些一九九七之前的論述，至今很多還在不斷的被重複生產，彼此之間本來已足以產生很大的張力與矛盾（見第二節）。不過，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主權國主導、很大一部份香港人認受之下，達成了新操作共識——具體表現在基本法的「矛盾統一」書寫。但是，因為近年中國的崛起，全球經濟的危機，思想界話語的更替，香港人主體性的複雜化，以前的這些論述或開始被重

新演繹，或受到挑戰，產生了新的論述可能，也因此產生更大的張力。

本文試圖指出，較完整的香港論述既離不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論述和主權國家論述，也缺不了本地人的本土論述。很明顯，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意識，在回歸後都在加強（鄭宏泰、黃紹倫 2008），但香港「本土」或「香港人」的主體性成份多元，本身是有歧義的，並不是不證自明的。況且，香港本土論述其實不能只看本土，還得考慮全球化資本主義與主權國的關聯性。

很多人認為，香港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雖說高度自治，香港往何處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決的，而是深受着內地發展的影響，也要看北京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同時，中國在全球體系不同階段的角色，也將影響北京對香港的政策。

但這不表示香港沒有自主的空間。很多評論都在探討這個空間，最常見的是從經濟角度找出路。在對香港的看法上，現代化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最新強調香港必須加入中國十二五規劃的中國依賴論述都把香港問題放在中國與全球經濟的範圍來談。這些同樣是經濟主義的進路，有三種不一樣的側重：一種認為必須讓香港在

經濟上對中國有意義，讓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以保香港的地位，避免被中國「撇賬」（雷鼎鳴 2010）；第二種主張香港應繼續保持在世界經濟鏈的重要位置，不能過度依賴內地，從而維持香港的經濟活力（陳志武 2007）；第三種認為香港經濟主要靠北京給政策，兩地必須融合，更要嵌入中國的五年計劃（劉兆佳 2010）。本文第三節將提出一些經濟以外的思考角度，因為只以經濟角度考慮內地與香港關係，低估了國家主權、維穩訴求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接受度的關聯性，更往往照顧不到特區內部的政治動態與主體意識。可以說，本文比一般帶經濟主義傾向的評論——以及之前的現代化發展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論述——更注重主權與主體這兩個方面。

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今日世界，有許多分別屬於不同主權國的特區，香港只是其中或許較受注意的一個。每個特區與所屬主權國的關係不盡相同，但特區的存在，或多或少都與主權、民族國家、族群、公民、人權、民主、憲政、法治、中央與地方這些好像自明的概念產生張力，而主權國也要對特區的存在作出解釋、提出受認可的說法。

但是主權論述是比較不能處理特區的主體意識的。如果特區本身有了主體意識、身份認同，

而這種意識、認同與主權國的主體意識、身份認同就算有重迭但卻有差異的時候，主權國對待特區的敘事與治理策略也相應的需要調整。

至於源自傅柯的現代性管治技術批判，加上受施米特及他的左翼「辯證追隨者」啟發，旨在挑戰西方自由主義憲政的新自由主義特區例外論（Ong 2006，Choi 2007），雖強調東亞國家對國內空間及居民作出差序安排的主權能力、管治技術和發展主義安排，卻忽視例外地區的主體性。

人類學家翁愛華在討論亞洲國家的特區即新自由主義的例外地區的時候，視特區為主權國——本身往往原本不是新自由主義地區——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式經濟發展的權宜回應，忽略了中國作為主權國對香港、澳門這樣的特區的历史與政治考慮。

但是特區例外論述卻提醒了我們一點：國家的主權論述，在面向特區的時候，不論對國內或對特區，事實上常常需要採用務實但妥協的說詞，輔以宏大民族主義愛國修辭和選擇性的歷史挪用來遮蔽論述中自相矛盾的部份，從而合理化特區的存在（見第四節）。

在內地的民間，網上較激烈的言論似更不願意容忍特區的特權。官方論述本來相對穩定清晰，但個別官方智庫學者的論述，以強世功的

《中國香港》一書為例，因為要肯定兩代領導人的永遠正確，遮蔽了內地過去六十多年特別是頭三十年部份不堪的歷史，因此解釋不了香港人對國族的複雜情緒。同時，強世功在官方論述之外，添加了一套新敘事，把香港放進一個重新演繹的中國當代史裏，以說明中共政權與大清帝國的中國天朝傳統有着連續性，含糊了大家對主權的共識，使得原來大家理解的官方論述多了一個不穩定的維度。

本文將以香港為例，順帶檢討中國部份國家主義者、右翼毛派、復古主義者及反西方現代的學者正在建構的中國天朝主義，指出天朝主義含糊了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也即削弱了連帶的主權觀念。部份天朝主義者如強世功更帶有決斷論傾向，意味着一切憲政或政治契約安排可以憑掌主權者的主觀定奪，因地制宜、審時奪勢而隨機改變。這些言論若擴大影響，將增加了香港特區前途及中國國家行為包括在國際上行為的不可測性（見第五節）。

除了民主論述與本土的文化主體論述外，其他論述包括新自由主義、特區例外論、天朝主義，不僅是忽略或否定特區已成型的主體性，還將特區「去政治化」，視特區為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或希冀特區不要政治化，這與逐步政治化

的香港特區現實有着認知的落差，削弱了這些論述對香港現狀的解釋或開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誤判。香港過去的六十多年，是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主體意識強化的漫長過程中。

這裏更要指出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影響香港人、香港身份認同、香港主體性成形的最重要決定因素（雖然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表現。一九四九年後「香港問題」的最重要奠基時刻，就是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在內地執政這個事實。這是很多內地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六十年代初及文革後大規模移居香港的主因（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這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到九七回歸前這段時間——特別是八九年六四後——幾十萬香港人移民外國的背景。這是為甚麼需要一國兩制這樣的安排。這是為甚麼至少一半以上的港人要求普選民主的動機（雖然不是唯一動機）。這是香港特區之所以要成為特區、以及一國為甚麼要兩制的所有解釋中的最終解釋。

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當然還有其他次要）是相對於內地中國而建構出來的，背後的歷史原因無關民族認同，而是對共產黨在大陸建政和政績的回應。這點不能迴避，否則不可能理解香港問題——中共的香港論述往往就是迴避這點，所以說不清楚港人心態。

內地每一個改變，也改變港人。壞的事情如八九年六四把港人推得更遠，好的轉變如改革開放經濟成長把港人拉近。香港人心回歸，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是否能把內地的事情做好。如果內地政府不自我檢討而整天怪港人拒中，那是本末倒置。

同樣，二戰後殖民地時期至回歸後香港本土民主進程的延擱與加速都是跟中國有關的（當然也跟港英政府有關）。一九四九年後香港本土工人運動的不振或冒進，也與北京的香港政策有關（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立場往往並不是左翼的）。舉這兩例是想說明當代香港事情是深受中國左右，哪怕是因此沒有發生的事情。所謂受中國左右，不一定是北京直接干預，而是指中國是香港政治想像的邊界，香港變化與不變的金剛圈。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對香港扮演重要的「有效行為限制者」的角色，在殖民者、特區政府、香港人考慮政治問題的時候，中國永遠是在「深層有意識」裏面，中國不是香港的外在因素，而是構成香港性的內化元素，是香港一大部份重要問題的最重要終極符號。

或者說，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往往是一種被衝擊然後回應的關係，內地衝擊香港，香港